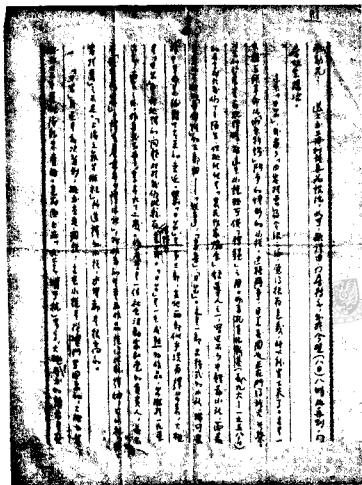


盧瑋鑾

寂寞來去的人：
柳木下

文壇春秋

1976年11月8日致
羅承勛先生函第一頁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思想起，我欠下好幾位曾深深鍾情於文藝，而在香港寂寞來去，幾乎被人遺忘的老作家的一筆債——也許他們不計較，又或許早已忘記，有過我這個訪問者，但畢竟我過不了自己欠債而疚歉的一關。他們一個個離去，証明了時間不為人留，我應改一改「等資料齊備才動筆」的習慣，把八十年代初做的訪問和抄錄報刊的卡片，整理一下，寫多少得多少，且也希望引起曾與他們交往過的老前輩注意，多補充些他們的事，或糾正我寫錯的，以便為香港文藝史多添些材料。

柳木下，是我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認識的香港文士。

到香港大學唸研究院，我在中文系當助教，從早到晚都在圖書館、辦公室看資料。他常去辦公室找馬蒙教授，馬教授叫我可與他接觸，以後，幾乎每個月都會見到他。

他稀疏斑白鬚髮，雙目紅腫濕潤，常要用手帕拭目。穿著尋常恤衫西褲，冬天多加件大衣，手提著舊書包，有時也會像日本人拿個布包，弓起背，蹣跚而行。好幾次，中午時份，在學生飯堂遇見他，他不是去吃飯，只在飯堂取杯白開水，送他自己帶去的麵包下肚。

他每月都會到港大走動一兩次，拿些他尋得的舊書去找中文系老師，他不是去賣書，是去推介手中書，很認真很誠意地解說那些書的內容、優點。然後，老師們自會問價，他開了價目，老師就會不多一句話掏錢給他。他不囉唆，也沒求助相，他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來賣書的。正因此，我從不敢在飯堂「請」他吃飯，看見他低頭在角落吃麵包，我就遠遠躲開，免他被我看到而難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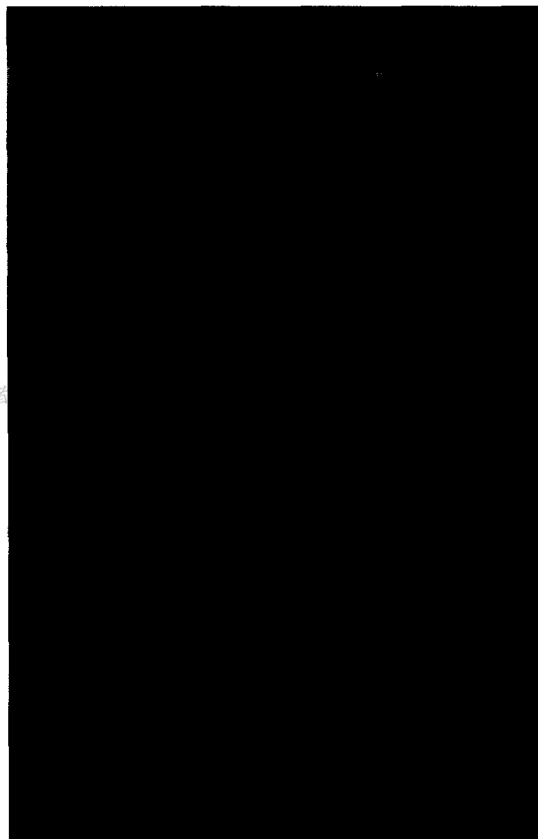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都知道，他來就是他要交租而欠錢的時候。我在港大，他已經沒有甚麼好的舊書了，但我總會全數收下，給他一點錢。他來到坐下，多帶苦澀笑容打個招呼，就把書拿出來，話不多。漸漸跟他熟了，才敢稍稍問起他的往事。比較知得全面些是1980年3月4日在我辦公室的一次詳談。下面是他口述的零碎材料紀錄：

1913年廣東出生，（盧按：有關他的出生年份，人言人殊，這是他親口說的，但無法證實正確否。）1934年1935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。往來滬穗之間，在中山大學認識了梁之盤，故當梁在香港創刊《紅豆》後，就邀他寫稿。1936年到了香港，曾在華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僑中學教了一陣子書，因不喜歡教書，辭職後就再沒做過甚麼長久工作了。1938年，一群本地青年文友：陳廷、杜衡、苗秀、麥思源、岑卓雲，當了《國際文摘》的編輯，也邀他參加了編輯委員會。此刊本屬《非非畫報》的增刊，以翻譯外國雜誌為主，由於抗日戰爭關係，要研究日本，找他翻譯日本雜誌。（盧按：我問他怎會識日文，他沒回答，也沒說到過日本留學。）後來不當編委，只擔任「特約撰述」。香港淪陷之前，他在《大公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國民日報》、《華僑日報》的文藝版寫詩、寫書評（盧按：在1940年12月8日《華僑日報·華嶽》寫了《讀〈航〉——馬蔭隱詩集》）。介紹希臘文化，特別在《華僑日報·華嶽》登詩較多。（盧按：1940年10月至12月他寫得最勤。我只把編目抄在卡片上，沒有影印入檔。）香港淪陷，他回內地，到1948年返港，與侶倫多見面。1949年譯寫兒童文學作品，並以「香港兒童文化工作者」身份署名宣言。（盧按：此時期，他也寫詩、譯詩，例如1950年4月10日《華僑日報·文藝》版，他寫了《論望舒的詩》）以後的日子，在香港沒有寫出多少東西。五十年代也為星洲世界書局編選文藝叢書。《海天集》是他唯一詩集。（盧按：「唯一」二字是他歎一口氣才說出來的。）

進入四十年代末期，他有些活動緊貼了政治性，例如1949年2月25日《大公報》刊出《港文化界發表宣言，反對釋放岡村寧次》，名單中有他署名。1949年4月15日的《時代批評》的《保衛世界和平特輯》，他寫了《粉碎那些陰謀和詭計》。我相信這不是他一貫作風，只是當時局勢，文藝界與左右政治表態關係扯得



1981年1月27日《中報》記者所攝

很緊。我也沒有追問他的政治取向。

有許多問題，我是迴避不敢問的，例如1937年他參加了廣州的「少壯詩人會」，卻跟該會詩刊《詩群眾》的主編鷗外鷗不和洽，到1983年我訪問鷗外鷗時，鷗外鷗就如此批評他：「他是個對自己生命不負責任的人。」故往後我沒問他那時的活動情況。又例如他的生活如何維持、進精神病院等事，我都不敢碰。八十年代，我在中文大學工作，大概因交通不便，他只找我一兩次。

他一向踽踽獨行，但卻意外地出席過兩次公開的文學活動。一次在香港大會堂高座演講室，日期忘記了，是「香港文學藝術協會」主辦的「文學月會」，戴天和我主持。會開到半途，他突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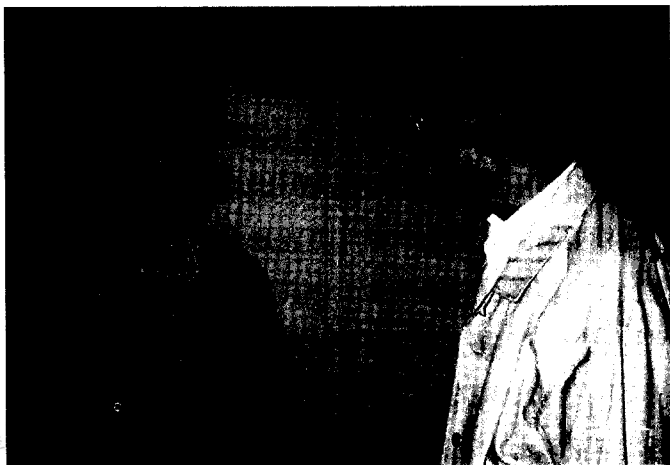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文藝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推門進來，戴天停了話題，向觀眾說：「呀！我們香港的詩人前輩柳木下先生來了，我們鼓掌歡迎。」我們都站起來鼓掌，並請他坐到前排。他沉默坐到散會。另一次是1987年7月25日，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」主辦「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」，他也來了，那天，是他與鷗外鷗兩位詩人遠隔四十多年後再度聚首，休息時間，他倆站在會場一角談了好久。他不肯拍照，我只好偷拍了一張，兩位二三十年代的香港重要詩人就在剎那留痕了。

許多文友都說柳木下患精神病，但直到八十年代，他的行為表現還是很正常的。他寫的文字也極有條理。他寫給羅孚先生的信足可證明。這封信寫於1976年11月8日，由於他到報社找不到羅孚，就寫信留言，介紹他要賣的書，我抄出一段，證實他的研究認真及對書的在行，行文也極具條理。

……這本《日出》，我看了「內容提要」的介紹之後，覺得很有意義，所以就買下來了。這是一本講蘇聯革命後「兩條路線」鬥爭的情形的小說，這種鬥爭，目前我國也正在鬥得如火如荼。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性，故這本小說頗可供「借鏡」之用。作者札莫依斯基（1896—1958）的名字對於我們十分陌生，但據說他是農民作家協領導人之一，寫過不少中短篇小說，而最重要的是他的自傳性三部曲——《牧童》、《青春》、《日出》。……上海文藝出版社所選譯的小說，水準都是很高的。《日出》我還是初次看到，……大概書出版後也不



1987年7月25日柳木下與鷗外鷗（右）合照

曾運到海外來賣。……

大概八十年代後期，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——他是從不打電話給我的，說他欠了籠屋的租，但自己又進了醫院，叫我代他去桂林街交租。我實在不敢單獨去，就叫了一個男學生代我去做這件事。好像過了一年，他再打電話來，說又進了醫院，這次他不是叫我去交租，而是叫我去他的住所取回他的行李。身為女性，我沒勇氣去取物，我只好請葉輝去了。那是他最後一次接觸我，以後就消息渺然了。

《日出》，一本536頁罕見的譯本，1976年賣港幣35元，還咬定是實價，就是舊書，仍屬高價，信中還交代「款請由門房轉交」，大概有點硬靠文友之助過活了。

讀他早年寫的詩，當見才藝水平不低，可惜有材不用，大半生窮愁潦倒，只靠賣書維持生計，這是詩人的性格悲劇，旁人也無由指摘。

他的作品不少，應該有人加以蒐集整理，作為香港文藝史的點滴。

香港文壇，給過他游走空間，只是他選擇了寂寞來去。●